



古典文学新视野
鼓浪学术书系

南宋初期的 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

钱建状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南宋初期的 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



陈植华 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

钱建状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钱建状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10

(鼓浪学术书系·古典文学新视野丛书)

ISBN 7-5615-2658-X

I. 南… II. 钱…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南宋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857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前埔东路 555 号 邮编:361009)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2 000

定价:1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古人有言：“学术者，人才之本也。”（颜元《习斋记余》卷一《未坠集序》）时移世易，此理犹然。鲁迅先生执教厦大国学院，重树人而弘学术，愤“死海”而思激扬，情出肺腑，言若金石。学子感奋，不憚弄潮，遂以“鼓浪”、“波艇”名其刊物，欲竞雄于风涛。斯人已逝，风范犹存。

鼓浪者，激浊扬清之谓也。语言寓褒贬，文学重美刺，艺术尚讽谏，“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章学诚《文史通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自古而然。时至今日，以道为教条则迂，以道为规律则活。昌明学术，始于实践；立言助教，贵在自得。鲁迅尝论治学于厦门，力非“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致许寿裳》），精警之言，足资启迪。

笃学精进，亦鼓浪之一义。王国维论古今东西之为学，谓不能出科学、史学、文学三者也。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偏，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遂而主此学而不从彼学。20世纪以还，文学与科学、史学交渗，碰撞诚难免，融合亦有缘。语言学卓然特立，贯通科、史、文而标领风骚。艺术学固自成一派，亦濡染风尚，关注声光电化，瞩目网际交流。信息如海，学术似潮。沧海无涯而人生有涯，惟不畏艰辛者能阅胜景；潮涨潮落而至理不移，惟潜泳渊深者可获骊珠。

书系设丛书若干，收录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近期学术成

果，陆续付梓。名以“鼓浪”，寄百舸争流之厚望，存继往开来之期许。语言与世推移，文学生生不息，艺术常见常新。先哲硕果，彪炳史册；见贤思齐，人之常情。有容乃大，育才斯馨。是为序。

《鼓浪学术书系》编委会

古典文学新视野丛书序

中国古典文学的悠久精深与厚重博大，犹如河海岱岳，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它所蕴含的精神财宝我们取之不尽，愈研弥新。因此尽管对它的研究已竭尽一代代学人的智慧与精力，取得了莫之与京的丰厚学术成果，但新的研究成果仍然随着日月而更新，以其颖异之特质，不断地增添着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光彩。这套古典文学新视野丛书，即是这新光彩之一。

所谓新，表现在这套丛书中是多方面的。比如所研究的课题内容与角度之新，就是其中最显著的共同特色。如对隋唐运河与中晚唐社会、文化尤其是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探赜，对宋南渡词人的文化版图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改变的论说，对中国古代官廷戏剧史的描摹概述等研究，其所探究的领域乃是新辟的研究园地，属拓荒探险之举，故多所创获与发明。又如研究视野的多角度与综合观照考察，在丛书中也是较为明显的。如对汉魏文学演进嬗变的论述，对宋末词人群体的考察、对《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传播状况的梳理等，其论述既有点的深度，又有面的广泛，故能全面而深入。近些年较为流行的接受史新理论的运用，则体现在建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上，故有新的见解与独特的阐释叙述。

中国古典文学从本质上讲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它具有文

史交融为一体的特质,属于文学的史学范畴。因此,对它的研究既要有文学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又要有史学研究的历史观照与手段。因而具备史家意识,采用文史结合,以诗文证史、以史释诗文的方法进行探索研究,也就是其研究的应有之义了。这样的研究总让人感到具体、深入、厚实、可信。先贤的传统文学研究具有这种优良的方法和学风,而本丛书也具有这一风貌。作者们不尚浮词虚谈,力戒肤廓臆说,以史实为尚,以史实资料为依据,以达到探究本原、合理阐释之目的。这种务实的研究精神,在作者们采用文史结合方法的各项专题研究中都颇为明显,因而这种研究常常采用大量的历史的文学的文献典籍资料;常常是颇为具体务实的详尽考察探赜;常常将文学文化现象置于当时的具体社会政治背景、社会生活、社会风尚与具体的地域环境和历史遗存风物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与阐释,从而力求还原其历史本来面貌。丛书中类此文史结合之研究多有体现,给人以鲜明的社会历史画面,它既是具体生动可触的,又是探微究奥,烛幽发秘,还历史以本真的实学研究。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今将其部分研究成果集为丛书出版。厦门大学中文系具有悠久的历史,鲁迅、陈衍、施蛰存、林庚等著名古典文学大师曾在这里任教与著述。半个世纪前,周祖谟师从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毕业后到这里任教,不久即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断代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随后的一段时期,厦大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实力也颇为学界所瞩目。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出于周先生门下的弟子们遵从师训,继续沉潜于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广取各家之长,探幽发秘,博考纵论,日积月累,多有创获,其中如林继中、贾晋华等遂成为当今在这一领域中颇有建树与声望的著名学者,为厦门大学的古典文学教学研究赢得了声誉。在这坚实的学术基础上,当今厦大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队伍又有了令人欣慰的新生机与新力量。其中尤其是本丛书的所有年轻作者都是近些年

毕业于全国各所重点高校、出于名师门下的优秀学人。他(她)们具有扎实的古典文学与古典文献学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辨析力,务实严谨、摒弃空言的优良学风,好学深思、勤勉于学的资质,这些均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我欣喜地预见到这些年轻的学者们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前景与成果,相信能不断努力,以屈子的坚韧不拔上下求索的精神与毅力去探骊得珠,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再创辉煌。

我忝为一日之长,承乏作序,介绍此丛书,兼略及厦大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之简况。是为序。

甲申年仲秋吴在庆序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听涛斋

序 一

建炎南渡，不但是朝廷由北而南，而且还是一次文化大迁移。由此带动文化版图的重组与文化中心的再建，在文化史上起着长远而持久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三次衣冠南渡，都伴随着自北而南的文化迁移。

第一次是永嘉南渡。西晋沦亡后，东晋定都建康，文化迁移就相伴而行。大批北方士族避乱南下，原先北重南轻的文化格局因而被颠倒了过来。王导、周顗诸人对泣新亭；谢安、孙绰、王羲之四十余人永和九年修禊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支道林等二十高僧，孙绰、王羲之等十八高士于剡县沃洲山禅院游息休止^①，就是南渡名流胜士的几次有名聚会。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浙一带，是南渡士族流寓与聚居之地。这些南方的名都大邑，就取代旧时的京洛，上升为文化版图上的新亮点，构成了经历重组后的文化板块。同时，丧乱之余的北方名士，栖托于江南的佳丽山水，中国文学中蔚为大宗的山水诗遂应运而生，会稽山水、永嘉山水、宣城山水，这些东南名胜，开始在南北文人的笔下，从自然形态一一进入了艺术形态。晋代士族可分两类。一类依仗政治权力高踞要津，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主要是指这类世家大族而言。一类是既有地位且

^① 《白居易集》卷六八《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面对天姥山，后来李白即因追慕晋人而梦游天姥。

富学养，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他们就与前者不同，往往世泽绵延，成为维系文运的文化士族。王羲之、谢灵运等人固然属于“王谢子弟”，但他们却是保持文运不衰的文化士族的重要成员。

第二次是唐五代士人南渡。唐代士人南渡，始于安史之乱。杜甫入蜀，李白南下江陵，二人最后都死于南方。唐末五代，黄河流域长期陷于战火。文化古都长安、洛阳，这两颗明珠同皇冠一起被打落在地。长安宗社倾覆，残破日甚，洛阳武人盘踞，无异犬狼窟宅。投奔西蜀或江南，则是北方士人逃离本土避乱免祸的上佳选择。西蜀本是关中的大后方，与中原阻隔。“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①江南富庶安定，南唐、吴越都能保境安民。北宋苏绅曰：“唐季之乱，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南唐）李氏能招携安辑之，故当时人物之盛不减唐日，而文风施及后裔，今显名朝廷者多矣。”^②西蜀词与南唐词，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超轶出群的。《花间集》编者赵崇祚，即自中原入蜀。《花间集》十四个前后蜀词人中，来自北方的多达八人^③。温庭筠孙温颜，也入蜀仕至常侍。温庭筠与韦庄，都曾到过江南。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不仅是韦庄个人的真诚表白，也是当时游历江南的士人共同体验。扈从过唐昭宗的韩偓，还避地入闽，定居于泉州。多少惊魂未定的漂泊者，在南方的都市繁华与山水流连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文化迁移，既有直流单向的，又有交互双向的，但主要是双向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可参看刘琳：《唐宋之际北人迁蜀与四川文化的发展》一文，见1992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文化研究》第二集。

②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五《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

③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花间词人事辑》，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可参看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文学重心的南移”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乃至多向的。在南北分裂与北方战乱时期,自北而南的单向的自然居多。到了国家统一之后,则转为由南返北的文化回馈与南北文化的双向交流。隋及唐初,六朝文风盛行于北,就是北方文化长期处于弱势未能取得平衡的表现。宋初的汴京,文化上不免仍是荒漠。三馆藏书与教坊乐队,几乎全部取自南唐。徐铉等文学侍从,大都为江南旧臣。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先后入京,宋词始盛。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家,三人来自江西,三人来自蜀中,均非北人。汴京作为文化中心,正是由于南方文化的反馈和南北文化的进一步融合造成的,终于造就了北宋一代人文之盛。

第三次就是建炎南渡。比之晋末和唐末,这是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文化迁移。

靖康之变后,北宋文化有两个流向。一是北上。汴京的宗庙供器,馆阁图籍,百工伎艺,教坊乐工,乃至西夏进贡书本,尽数为金人所取,掳掠而北^①。先前使金被留的宇文虚中、吴激诸人,也被列为金代文士的中坚。一是南下。宋兵溃退之际,衣冠之族率皆挥泪告别乡梓,举族南迁。山东如钜野晁氏,河南如韩氏、吕氏,都是南迁的著名文化士族。他们不仅广布于两浙、两江地区,还远及两湖、福建和岭外的两广。南北文化版图至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业已积淀坚实丰厚的南方文化,在宋室南渡之后,由于南北文化的进一步汇聚交融和南方文化中心依次的建立,在史学、文学、理学、绘画、建筑、宗教以及百工伎艺等众多方面的实绩优势和长远后劲,就日益显现出来。

南北文化交互消长盛衰,自然与河山易代之际的文化迁移有关,但并非全是文化迁移所造成,至少不是唯一的因素。西晋之后,先后在北方立国的匈奴等五个少数民族,文化上远未臻于文明之域,自然无力也无暇参与填补文化南移所留下的巨大空缺。隋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唐统一以后,才有可能整合南北而重建灿烂的华夏文化。唐末五代政权,都掌握在专横跋扈的武人之手,不能指望北方文化在屠刀之下得以保护和恢复。重建统一文化是北宋定都汴京之后所确定的宏伟目标。取代北宋入主中原的女真族,文化上无疑有较快的进展,但在中土精英流失之余,与于斯为盛的南宋文化终究难以抗衡匹敌。即使在元代建立起空前的大帝国后,崛起的南方文化始终保持着自己不可阻遏的优势。

另一方面,北方文化的日趋衰落其实南渡之前早已开始,而南北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使文化上原有的鸿沟随之而不断扩大。在洛阳司马氏政权之下,先是何晏、嵇康等人被杀,天下名士去其半。“八王之乱”中,张华、潘岳、陆机、陆云等又相继遇害。西晋文化,实际上先于宫门外的铜驼埋葬在荆棘与血泊之中。唐末五代的文人命运,与兵连祸结相始终。只有冯道这样的人,厚颜取容,历事五姓,居然自命“长乐老”,为人不齿。北宋文化,自景祐到元祐这六七十年间,达到极盛。蔡京专权后,立党人碑,禁元祐学术,诏毁苏、黄等诸家文集^①,甚至私人书札凡有违碍者都被检举论罪。新旧党争终于发展为一场文化灾难。宋徽宗与蔡京,本身也精于艺事,但包括设议礼局、立大晟府以制礼作乐的所谓“宣政风流”不过是粉饰太平的亡国之前的虚火潮红。^②“靖康之变”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不能不认为是咎由自取。正气消铄的北宋文运,至此亦确实难乎为继。与之相比,东晋的文治简约宽容,西蜀江南好文礼士,南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一,崇宁二年四月乙亥,“诏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

②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十音乐门序:“崇观小人用事,倡为丰亨豫大之说,以文太平。虽能作大晟乐,置大司乐,要亦不过崇虚文以饰美观而已,亦奚救于宣靖之弊哉。”

宋之初号称“中兴”，推尊元祐，广泛起用忠贞名节之士，士气峥嵘，民心可用。新的环境孕育着新的生机。三次南渡，在文化上亦为存亡续绝，中土文化易地生根，从而获得新的转机，实现新的进展。

钱建状博士的《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即是研究建炎南渡这次文化大迁移的。它以沧桑易代后靖康、绍兴这四十年间为背景，以南宋初年的词坛为切入点，就历史关头通常发生的文化版图重组与文学命运再造进行重点考察，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此类研究，他还是率先尝试来做的。钱建状博士专攻文学，但他同时爱好读史，有志于从文史兼备这个方向继承前辈的学术传统，本书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所学所长。去年夏天，他应聘前赴厦门大学执教，临行前我写了四首绝句为他送行：

出头安脚亦前盟，纵辔天南壮岁行。
后夜枕边听鼓浪，胸中百丈海涛声。

漫卷诗书入闽南，鹭江一勺亦微甘。
晦翁旧学今难续，别有瀛洲海客谈。

汴京遗曲漫低回，南渡笙箫亦可哀。
且向峰头振衣袂，海天风雨洗心来。

鹭江浙水两通潮，点击今能慰寂寥。
黉宇而今吟事尽，吴娘谁唱雨潇潇。

时隔一年，本书得以出版，为之高兴。钱建状博士为学勤奋，矢志不移。我与他三年相处，晨夕讨论，每得相与之乐。希望继本书之后，看到他在学术上的更多新的收获。

吴熊和
甲申暑中于杭州

序 二

读罢建状君的博士论文，有两大惊喜。

一是惊喜于他的学术进步。当年他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就觉得他学习很勤奋，思维敏捷，有悟性，只是才华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学术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自2000年负笈杭州师从吴熊和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后，经吴先生的耳提面命，棒喝点拨，建状可谓一日千里。特别是在文献考据方面，进步极大。他经常写一些考证宋代诗人词家生平事迹的论文，每写完一篇都会用电邮传来一份，我读后为之终日喜，兴奋之余有时不免技痒，对他的文章进行砍削增补。他修订后又返回给我，再予印可，时得切磋之乐。当时我还只觉得他实证研究的功夫已经相当硬朗，写起考据文章来得心应手。及至读到他的博士论文《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一书，更是喜不自胜。原来他的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也已令人刮目相看。这本书已很好地将实证性的研究与理论的思辨有机结合。书中引证的资料非常丰富，有不少是第一手新资料，这些新的原始资料是他在阅读大量的宋人典籍后挖掘筛选出来的，这与他的考证功夫有关。资料虽然丰富，但不是堆积、死用资料，而是用思想、见识将资料灵活贯穿起来，随时可见他智慧的灵光闪现。有了坚实丰富的史料，使得思辨不流于空泛抽象，富有说服力，而显得厚重扎实。

二是惊喜于他的开拓精神。本来宋南渡前后的诗词，已有了好几本博士论文，前有台湾黄文吉教授的《宋南渡词人》，后有我的

《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近有台湾李淑芳博士的《宋室南渡前后诗词衍变研究》。这几篇博士论文对南渡诗词都有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要有所突破，似非易事。我在出版《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博士论文之后，也曾想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但一时不知从何处下手，才能有所突破，写出面目一新的著作来。而建状这本书的切入角度和整体框架又令我惊异，原来还能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这样去突破，去开拓，去深化！前面说的三篇博士论文，都只说到宋南渡的诗坛词坛是怎样的情形，有什么样的进展和变化。而建状此书则进一步考察南渡时期的诗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即进一步探讨南渡时期文学的生态环境，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南渡时期，无论是政坛巨公，还是文苑名流，我都不太陌生，仿佛是老朋友，可我对他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又并没有真切的了解，似乎朦胧地感觉到一些，但一时又说不太清楚明白。经建状的考察，我大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这些老朋友是这样生活的啊！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原来是这种状况啊！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局面，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出现人们期待中的新格局、新气象、新范式。人们既不满足于现状，又一时突破不了现状。我本人就有着深深的困惑，总想超越自我，寻找新的突破口，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可“寻寻觅觅”，还是“冷冷清清”，无所收获。今读建状此书，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觉得建状此书有着学术创新的“标本”意义。这就是“历史文化”研究给予的启示。

“历史文化”的研究，从名称和方法上看似无新鲜之处，历来研究古代文学的，都会注意历史和文化。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进行历史文化的研究。过去我们进行历史文化的研究，注重的是政治大事件、文化大背景，而时或没有落到实处。政治文化的大背景，固然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会产生影响，但有着怎样的直接影响，就常常不甚了然，似是而非。而建状此书是将历史文化落实到具体的

政策措施和社会制度的层面,深入到社会政治的运作机制,深入到作家个体的生存环境。比如,宋室南渡,主要是哪些人由北方南渡而来?南渡后的北方士人又怎样生存?这种生存状况对他们的心态与创作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回答过。而建状用详实的史料,将这些问题一一落实,说得明明白白。书中考察了南宋政府安置自北南来的士人的一般政策和特殊政策,就让人了解到北方士人如何在南渡后安身立命,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融入到南方文化之中,从而改变了南方的文化版图。

关于宋室南渡后的中国文化版图,建状也提出了新见解。中国文化的重心三次由北向南的转移,自从陈正祥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提出来后,已为学界所认同。但经靖康之难第三次南移后,南方文化版图所形成的新格局,学界主要着眼于江浙文化的发达、川闽赣文化的发展,却很少注意到岭南文化的进步。而建状此书,就特别指出了由于北方士人南渡避难纷纷涌向相对安全的岭南地区,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所谓南渡后文化版图的重组,不仅是指文化的轴心已由北宋的京洛地区移到苏杭的环太湖流域,四川、福建、江西等地的文化迅速崛起,更指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呈现出的新趋势。南渡后贬居岭南的北方士人,一方面参与岭南文化的建设,提高了岭南文化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岭南文化的发展进步,又加强了北方士人对岭南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认同感。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改变了南方文化的版图,也改变了文学的发展走向。

研究历史文化,建状并没有忘记文学的“本位”。文学研究工作者研究历史文化,目的是为了从更深的层次上解决文学的问题,而不是用文学的资料证明或解决历史文化的问题。文学研究者与历史文化研究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文学,后者是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历史文化。建状在考察南方文化版图重建之后,接着考察南方文学的再造与发展变化。南渡后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轼词风的重振。南渡后苏轼词风的重振,时贤也早